

人人都能中“大奖”？

近来，有消费者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些珠宝玉石店购物后，“好运”随之而来——在商家安排的“抽奖”活动中抽中“大奖”，以一折的价格购买店内标价动辄数千元的玉石珠宝。但《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用来抽奖的奖券被动过手脚。而这些一折价格仍达几百元的“玉石珠宝”，成本仅有数十元。

“抽奖”固然是一种讨巧的促销手段，利用消费者的好奇心来激发其消费热情。可在这个过程中用障眼法做手脚，涉嫌欺骗、诱导消费者购物。而对消费者来说，一旦尝到了便宜的甜头，就可能头脑发热、进而冲动消费。对商家这样的骗术和伎俩，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发现查处，而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消除占小便宜的心态，无疑更加必要。

见义勇为限省内？

据《成都商报》报道，今年51岁的成都游客孙川在斯里兰卡旅游时，为救同伴不幸身亡，目前家属正为其申报见义勇为。但当地政府部门认为，见义勇为只适用于省内，并且孙川所救的是同行游伴，从法律上讲，救“熟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仍存在争议。

由救人的技术与能力之辩，引发是否提倡见义勇为等讨论，到如今，救人地点和对象的特殊性再次将见义勇为推向舆论焦点。其实，几个月前，安徽籍留美博士曾在美救助他人而不幸遇难，而安徽省针对本省人员在本省行政区划外见义勇为的行为，就有明确的予以奖励和保护的规定。针对类似特殊情形，是否该有统一之规？

“强拆”城市报刊亭？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北京市朝阳区72座报刊亭被“强拆”一事，8月10日，朝阳区政府回应称，朝阳区依法修改不符合设置规范的报刊亭，其中改移71处，规范1处，并非拆除。对于报刊亭主中确实困难人员，经属地办事处审核将给予救助。

如此的回应或许让大家稍微松了口气。其实，来自市民的忐忑与担忧，更多的是对以报刊亭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的一种眷恋，公众企盼报刊亭能向更好的方向整改，而非越改越少、越整越乱，更期待相关职能部门在满足市民文化需求和维护良好市容市貌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让这宝贵的城市文化风景得到应有的呵护。

说不定也能得到一纸“红头文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女士被骗事件再一次向社会昭示，尽管有关方面持续打击司法腐败行为，但要彻底根绝“捞人”现象，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比如，强化政府有关部门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坚决杜绝行政干预司法审判和执行的行为，非法干预的现象少了，骗子们大行其道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对于那些自诩可以“捞人”的能人，有关部门应该给予严惩，让其承受应有的法律责任，使其不敢动“歪念头”；加大普法教育力度，让那些深信“捞人”可行的人不再抱有幻想。

灾难面前，村民的纯朴无私得以体现。几个村庄从江边到半山腰遍分布，地震发生后听到新发、羊龚田、旱谷地有人被压，沿江几个村的村民都从山下奔上来救人。几个小时过去，赶来救人的村民才发现山下的家已经被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淹没了，连屋顶都看不见。羊龚田村民李立鼎、李立怀以及肖烟平、肖烟族、肖烟青等5户村民的家都是这样。

“啥都不剩，房子家具粮食牲口，什么都没了。”李立鼎的弟弟李立松揉着眼眶哽咽着告诉记者。

从羊龚田村望去，牛栏江对岸是鲁甸县灾区，左侧隔着一条小河是巧家县灾区，李立松估计，“这个三县交界的江边，恐怕有200来户村民的家被淹没了。”

新发村党总支书记李立安地震时也在地里摘花椒，等他抢救完其他村民回家后，才发现自己媳妇也被倒塌的土墙压住，“她断了17根肋骨，左边5根，右边12根……”

（本报云南会泽8月11日电）

（本报云南鲁甸8月11日电）

书记当时问我在不在现场，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最后他说，“不要着急，救援队马上到，我也马上到，你现在要组织大家开展自救。”

卢敏告诉记者，接到省委书记秦光荣的这个电话，让他的心里更加有了底了。当晚，云南省省长李纪恒赶赴龙头山镇。在暴雨中，给所有灾区干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当时在室外开的，我坐在第二排，会上安排我做安置点的工作。”

地震发生后的前两个晚上，卢敏都没睡觉。

话音刚落，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杨应楠经过灾民安置点，随行干部让卢敏陪同介绍。记者决定跟随他们一行。

考察队伍先后步行到了临时医疗点、老街、镇政府，大多数时候，卢敏跟随在队伍后面，偶尔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经过卢敏负责的灰街子灾民安置点时，天色已经暗了下去。考察队伍准备返回，而卢敏也快速走向了安置点。

这片与卢敏性命相连的土地，迎来了震后的又一个夜晚。

（本报云南鲁甸8月11日电）

警惕“市场化”异变为金融腐败的隐形通道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市场化”异变为金融腐败的隐形通道，一方面导致金融腐败发现难、认定难、查证难；另一方面隐形的贪腐会扭曲社会经济格局，增加企业正常经营成本，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腐败行为可能导致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内部审计监督机制流于形式，不能有效地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动摇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的落实，甚至可能冲击国家的金融监管秩序。

对习惯性傲慢说“不”

□张玉胜

市民冯先生今年5月份在广州公证处办理网页公证时，550元的项目被违规多收了1450元。经举报后，广州市物价局确认收费违规并责令广州公证处退款。广州公证处于近日以发公函的形式通知冯先生前去公证处领退款。冯先生觉得对方此举十分傲慢，遂自制“红头公函”答复对方：要么将钱打到指定账户，要么预约之后到他的住处办理退款手续，且限于三个工作日内。（见8月10日《南方都市报》）

按照一般人的习惯，既然对方已经承认错误并书面“通知”了退还多收费用的事项，只管前往领取便是。但冯先生并未轻易“就范”，而是从对方的行为中解读出了“傲慢”的意味。尽管以自制“红头公函”，模仿对方语气的方式回应对方，的确不乏调侃与滑稽，但仔细想来，这种回应的创意却不无维护尊严、敢于对强者的傲慢说“不”的社会效应。

550元的公证项目竟然被违规多收了1450元，该公证处的收费不“公正”显而易见，受到物价部门“责令退款”的依法查处当属咎由自取。作为违规收费的实施方，按说应以愧疚的心情、谦卑的姿态，改过的诚意，主动将多收费用来“送”至受侵害对象的家中，且辅以赔礼道歉，即使非要当事人到公证处交割款项，也应以协商

的口吻，“道歉”在先、“请”字随后，方能显示其真心实意。透过改“退”为“领”的“公函”通知方式，人们不难看出某些部门和单位长期以来形成的傲慢和轻视公众利益的现象。

围观以“自制公函”答复红头文件的索要退款方式，其看点并非只是对领取方式的“较真儿”，而是对权力傲慢的“叫板儿”。如果为公证处的“公函傲慢”把脉，其病因大概有三：一是官办思维作祟，再加上公正处的特许经营地位助长了一些机构的底气，凡百姓“公证”事项必有求于我，不怕你不来；二是监督的机制乏力，公证处违规被查缘于当事人举报，反衬出物价监管的不到位；三是违规成本低让一些人难有遵纪守法的敬畏之心，多收近乎三倍的“乱收费”，不过是一退了之的处罚，其震慑效力自然不高。

由是观之，遏制“公函傲慢”，除了引入制度创新的机制改革、提升常态化监管的制约效力，加大违规问责的处罚力度，还需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监督力量，那就是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觉醒和善于监督的较真态度。如果每一位国人都具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公权傲慢自当有所顾忌与收敛。

不良后果的违规违纪事件，有关善后事宜现责成当地严肃处理。

在“八项规定”和地方多重禁令下，公务员“陪酒猝死”不时发生，这样的新闻显得刺目。地税职员、民警、镇干部……盘点“陪酒猝死”案例，大多发生在接待领导的酒桌上。喝酒的主力军，往往就是这些“陪酒”的普通干部。

2014年7月14日晚，湖北恩施州来凤县地税局一名年轻干部，因陪调研的州局领导喝酒过量而猝然身亡，事后通报称事发单位食堂，同年4月，广西来宾一副镇长上任首日在食堂“接风酒”死亡；2013年，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

“高起点规划、大资金投入、精细化管理、深层次创新”的“职工书屋”建设，计划用3年时间在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和工业园区建设500~600家省级标准化“职工书屋”。

为了不让建好的“职工书屋”变成“锁起来的黑屋子”，很多书屋建设单位因地制宜，将“职工书屋”建在中小企业比较集中的工业园区，建在职工相对集中的社区，建在方便职工借阅的宿舍区。有时为了让职工得到一本“量身订制”的专书籍，工会干部甚至和书商一起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书籍。

项目实施当年，合肥市总工会不仅提前完成年度200家“省级职工书屋标准化”的建设、验收、资金拨付等工作，而且在合肥市民生办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的中期绩效评价中被评定为“优”等次，成为全市提前完成的4个民生工程项目之一。

鉴于“职工书屋”建设在合肥市取得了既“叫好”又“叫座”的效果，安徽省总积极推动其他市县借鉴合肥市的成功经验。目前，淮南、滁州等地已经开始将“职工书屋”建设纳入当地政府的民生工程。

今年“五一”期间，一名经由“职工书屋”淬炼过的职工——国网安徽宿州供电公司许

间以来，“行长落马”在多地频发，受贿数额最高已上千万元。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原副行长杨琨等20多人，这些人犯罪的方式不同，但都把贷款当成“唐僧肉”，以“市场化”的名义，靠签字批条变相造就“千万行长”。

一些金融机构的高管利用掌握的贷款审批权，采取暗箱多种方式选择放款对象，表面上看符合相关规定，但实际结果是，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贷不到款，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却拿到了钱。有些高管热衷曲线获利，牟取“股权”，通过债券交易、股权交换等市场交易方式实施间接的利益输送，任内受

赠贷款企业股权、退休后再“变现”。有些高管以权谋私，涉嫌非法诈骗，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表面上好像是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吸收存款，但实际上不少人将存款和理财资金转移到自己控制的账户上，好处留给自己，风险留给银行。此外，一些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相互串通或者与行外人员勾结，以“市场化”为形式，掩盖其非法获利的真相。

金融腐败案件频发，容易给国家经济带来无法预料的隐患和风险。“市场化”异变为金融腐败的隐形通道，一方面导致金融腐败发现难、认定难、查证难；另一方面隐形的贪腐会扭曲社会经济格局，增加企业正常经营成本，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腐败行为可能导

致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内部审计监督机制流于形式，不能有效地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动摇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的落实，甚至可能冲击国家的金融监管秩序。特别是

因此，一定要从制度、机制、监管等多方面进行防控，绝不允许以“市场化”为幌子、搞变相权钱交易之类的金融腐败行为蔓延。比如，消减行长“一支笔”现象，强调资金审批权合一；推进金融改革，杜绝贷款“灰色成本”；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防止行业不正当竞争；强化金融高管的任后审计制度，适当延伸监管期限，减少信贷权力“期权”化的发生。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李法明/画 小郭/文

据《新京报》报道，在新疆乌鲁木齐一家影院，13岁以下的观众是不能看《京城81号》的，即使买票，也会被做退票处理。因为该影城从7月中下旬开始实行“电影分级”，对于分级标准，影院经理介绍，包含较多暴力、血腥、恐怖等镜头的影片被归为特别辅导级，这类电影是禁止13岁以下观众观看的。

分级

据《新京报》报道，在新疆乌鲁木齐一家影院，13岁以下的观众是不能看《京城81号》的，即使买票，也会被做退票处理。因为该影城从7月中下旬开始实行“电影分级”，对于分级标准，影院经理介绍，包含较多暴力、血腥、恐怖等镜头的影片被归为特别辅导级，这类电影是禁止13岁以下观众观看的。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据《新京报》报道，在新疆乌鲁木齐一家影院，13岁以下的观众是不能看《京城81号》的，即使买票，也会被做退票处理。因为该影城从7月中下旬开始实行“电影分级”，对于分级标准，影院经理介绍，包含较多暴力、血腥、恐怖等镜头的影片被归为特别辅导级，这类电影是禁止13岁以下观众观看的。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客观而言，电影分级会抑制一部分影片的上演，影响一部分观众观影，从而对票房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有一些人质疑电影分级的执行效果，但它让人看到了一家影院的责任感——影院不仅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也是引导观影、引导观众的地方。一家民营影院能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确实不易。虽然对此的争论可能不少，但大可以“且行且尝试”。

“捞人”的骗子缘何屡屡出没

不断进步，但仍有一些人面对此类情况，不是找懂法律的人咨询应对措施，而是希望找到有关系、手眼通天的人来“捞人”，即有些人找了律师，也往往是希望律师有关系能“捞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捞人”的生存土壤在一些地方是真实存在的。换句话说，王女士之所以上当受骗，是因为确有一些地方发生过有些司法机关，违背法律规定给一些犯罪嫌疑人提供方便，使其得到法律“照顾”。于是，现实中总有一些人抱有某种幻想，期待通过某种非正常渠道使其免受应得的惩罚。

比如，前不久曝光的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通过一些人的关照和操作，在法庭审判中通过造假立功轻判，在监狱里通过造假材料减刑，进而在很短时间内出狱。再比如，湖南省双峰县委书记、县政府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娄底市委政法委“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理由是“如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之类。试想，如果王女士找到了人，

局”，成为利益交换的平台。推杯换盏间可以拉近关系，继而提出正规场合下“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诉求。

“至少一斤的酒量，干得好可以转为公务员、女性，身高一米六二以上……”这是粤西某县在一场跨省招聘时提出的要求。“‘酒规则’横行，说白了是官场‘潜规则’当道。”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

如果不是意外发生，干部吃喝中的豪饮问题，依然会披着“工作餐”的外衣，藏匿于单位食堂、“八小时之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付立家等专家表示，要靠拔“喝出病的”萝卜”，才能带出吃喝的“泥”。

面对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陪酒成风现象，监督、惩戒力度仍显不足，缺乏具体处罚细则。要打破“酒桌办事”的局面，要严格追责。

专家认为，面对一些地方“两桌”不良风气的反弹，应建立事故责任倒查赔偿机制，要禁绝胡乱吃喝“处理进”公务开支。继续推进更加规范的预决算公开制度。堵住财务报销漏洞，例如将公务招待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开支情况等定期公开，接受监督。顶风酗酒，就追查，整治“酒风”，对广大基层干部来说，是解脱也是保护。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专电）

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建议。报告得到了省委书记张宝顺的专门批示，为省委、省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制定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针对开发区、工业园区兼具企业密集、产业关联、职工集中等特点，今年，安徽省总着力加强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工作。全省选聘55名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进驻开发区，安排100万元经费重点推进园区帮扶站建设。

为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创新职工技能培训新方法、新途径，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工商联等单位共同举办安徽省首届职工技术比武运动会，组织166个工种200万职工参加比赛。同时延伸全省“十大能工巧匠”评选链网，首次开展“安徽省十大带徒名师”评选，进一步深化名师带徒、师徒结对活动。

为了最大化地发挥劳模精神的正能量作用，安徽省总从4月下旬开始，在全省5000辆省际客运班车上张贴劳模车贴画。同时，芜湖、马鞍山、宿州等市400辆公交车也张贴了劳模宣传画。全省城乡出现了一道道靓丽的劳模风景线。

立意高、目标高、要求高，安徽省总工会一系列的创新举措带来的变化是，职工群众得实惠，工会形象得提升，社会和谐得发展。

震灾，一个村庄的“诉说”

（上接第1版）

而在6公里外的江边村委会，记者看到，房屋均为钢筋混凝土砖房，房屋有受损，但没有一间倒塌伤人。村民彭代住告诉记者，“如果新发村的房子也是钢筋混凝土砖房，就不会倒塌伤人。”

“就是买了砖也运不进来，你瞧这个路走牛车都困难。”村民李立文忍不住叹气。

家已是汪洋一片

地震时，新发村村民崔世荣正在采摘花椒，猛烈的力量把他从树上颠下来，惊魂稍定的崔世荣，立即往山下村子奔去。他平时在昆明黄土坡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因为要摘花椒，7月5日他才从昆明回到家。

唐耀民和崔世荣一样，惊魂甫定，立即奔赴垮塌房屋用手刨土救人。“我们刨出来5个人，死4个，活了1个。”他伸出指甲盖里尚有泥土的双手，“等救援队来了，刨出来的两个人都死了。”

（上接第1版）

到达龙头山镇，是晚上5点半左右。地震刚过去一个小时。

“到处都有人在喊救命，镇政府二楼变成了一楼，派出所的土坯房全倒了，6名干警都被埋在了下面，有个小伙子当时被埋在废墟下，他拉着我的手喊我救他。我和旁边的人把他刨出来以后，用门板抬到镇上的医疗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卢敏眼眶泛着泪花，“镇政府一个小伙子的女朋友来看他，也死在里面了。”

“看到当时的情况，害怕吗？”记者问道。

“怕！咋个（为什么）不怕？但是那个时候都来不及害怕，到处都是呼救声。”卢敏立即组织灾民展开自救。

采访过程中，卢敏不停地接电话，当记者问她家里的受灾情况时，卢敏说：“没有时间顾那么多。”据记者了解，卢敏家住鲁甸县城，女儿在昆明上学。但对于具体情况，她始终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8月3日当晚接到的一个电话，卢敏记得清清楚楚，“晚上7点半左右，接到昆明一个座机电话，那边说省委书记要和我通话，秦

书记当时问我在不在现场，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最后他说，“不要着急，救援队马上到，我也马上到，你现在要组织大家开展自救。”

卢敏告诉记者，接到省委书记秦光荣的这个电话，让他的心里更加有了底了。

当晚，云南省省长李纪恒赶赴龙头山镇。在暴雨中，给所有灾区干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当时在室外开的，我坐在第二排，会上安排我做安置点的工作。”

地震发生后的前两个晚上，卢敏都没睡觉。

话音刚落，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杨应楠经过灾民安置点，随行干部让卢敏陪同介绍。记者决定跟随他们一行。

考察队伍先后步行到了临时医疗点、老街、镇政府，大多数时候，卢敏跟随在队伍后面，偶尔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经过卢敏负责的灰街子灾民安置点时，天色已经暗了下去。考察队伍准备返回，而卢敏也快速走向了安置点。

这片与卢敏性命相连的土地，迎来了震后的又一个夜晚。

（本报云南鲁甸8月11日电）